
略论台湾义勇队的抗日活动

楼子芳

台湾义勇队(也称台湾抗日义勇队)是抗战期间由在大陆的台胞组织起来的一个人数最多的抗日团体。它活跃于东南战场,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台湾义勇队光辉业绩永载史册。《台湾义勇队队歌》前几年被收入新出版的《抗战歌曲精选》(朱绛编,大江南北杂志社1987年版)。1992年是台湾义勇队队长李友邦将军逝世40周年,海峡两岸为此曾举行纪念活动。^①本文拟通过评述台湾义勇队抗日斗争的历程,缅怀其业绩,略瞻其风采。史实表明,历史上的许多重大胜利,都是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所共同奋斗的结果。

台湾义勇队从组建到解散共7年多时间,可分为三个阶段:

筹建时期(1938年夏至1939年2月)。

台湾义勇队是在中华民族抗日救亡高潮中诞生的,它是在中共浙江省委和国民政府浙、闽两省政府的具体帮助下,由台湾爱国志士李友邦创建的。

^① 李友邦1952年4月22日被国民党政府枪杀于台湾。1992年4月21日,台盟中央、全国台联在北京联合举行台湾爱国将领李友邦逝世40周年纪念会;4月18日,李友邦将军遗孀严秀峰女士及各界人士在台北鹭洲乡发起举行“李友邦先生逝世40周年追思大会”,台湾历史研究会于3月29日在台北市召开“李友邦逝世40周年学术研讨会”。

李友邦(1906—1952),字肇基,台湾省台北县鹭洲乡人。青年时代就立志献身于祖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事业。1924年入黄埔军校,投身国民革命,在广州组织“台湾独立革命党”。大革命失败后,先后在台湾和杭州从事革命活动。1932年在杭州被捕入狱。在浙江陆军监狱的两年时间中,他努力学习,坚持狱中斗争。出狱后,他在杭州、上海等地以教日语为生,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并编著《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一书,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台湾的罪行,因书稿毁于战火,而未能出版。“七七”抗战的炮声,激起了李友邦参加祖国抗战的热情。

抗战初期,浙江军民掀起了抗日高潮。上海、杭州沦陷后,大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纷纷云集浙江金华、丽水等地,各种形式的抗日组织和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建立。当时,李友邦也在这里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并酝酿组织抗日团体,准备发动台胞参加祖国抗战。他根据抗战以来的新形势,确定台湾独立革命党两大工作任务:一是组织台胞“直接参加祖国抗战”;二是“在台湾本部发动各种暴动”。^① 1938年夏,他在丽水向原浙江陆军监狱的难友骆耕漠(中共党员)提出自己的设想,他说福建崇安县(现名武夷山市)有不少从台湾被迫流亡回祖籍的台胞,可以把他们组织起来参加抗日。骆耕漠表示支持,并报告中共党组织,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决定派骆耕漠、张一之(中共党员,后改名张毕来)协助李友邦在金华筹建台湾义勇队。^② 在张一之的具体协助下,李友邦开展筹建台湾义勇队的工作。他们首先恢复大革命时期建立的“台湾独立革命党”,并拟好《台湾独立革命党告台湾同胞书》,同时了解散居大陆各省的台胞情况,决定动员工作从台胞居住人数最多的福建省开始。从1938年11月起,他们几次往返浙闽两省,把集中在闽

① 李友邦:《台湾义勇队之组织及其工作》,《东南战线》第1卷第4期(1939年3月5日)。

② 骆耕漠:《赤诚的爱国主义者——纪念台湾义勇队创立人李友邦》,《文史通讯》1981年第6期。

北崇安县台胞分批带到浙江金华参加台湾义勇队。在此期间,李友邦又以台湾独立革命党的两大工作任务及《告台湾同胞书》中的六条具体行动为内容,制定了《台湾独立革命党最近行动大纲》,共十条:一.抗拒缴纳赋税;二.反对抽征壮丁来华作战和开垦;三.已被诱迫来华的台胞,组织哗变;四.破坏台湾生产和交通;五.扩大阿里山的反日游击队;六.组织义勇队来华参加抗战;七.发动台湾罢工罢市罢课运动;八.扩大反战反法西斯宣传;九.组织日韩台反法西斯大同盟;十.统一台湾革命组织。^①李友邦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动员在大陆的台胞组织台湾义勇队,作为实现《行动大纲》的首要措施。

在筹建台湾义勇队的过程中,李友邦还得到浙闽两省政府的支持。1938年11月初,李、张两人的福建之行,首先得到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的赞同和资助。黄绍竑给国民党福建省党部负责人陈肇英写了信,并资助600元活动费。在福建,李友邦得到了陈肇英及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赞许,他们同意把集中在崇安县的台胞带至浙江。^②

李友邦发起组织台湾义勇队,广大台胞热烈拥护,纷纷报名参加。1939年1月,李友邦从福建崇安县顺利地带来了第一批台胞30余人,其中有6名儿童。同年2月,在浙江省金华县城酒坊巷18号正式成立台湾义勇队,6名儿童也组成台湾义勇队少年团(简称台湾少年团)。李友邦任队长兼少年团团团长,张一之任队秘书,还编写了队歌和团歌,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和台湾义勇队队员牛光祖分别为队歌、团歌谱曲。从此,它的歌声响彻祖国大地。台湾义勇队的战斗口号“保卫祖国,解放台湾”,也写入了《台湾义勇队队歌》之中,使每个人都知道要为“保卫祖国,解放台湾”而战。

① 《东南战线》,第1卷第4期(1939年3月5日)。

② 张毕来(即张一之):《台湾义勇队》,《革命史资料》第8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

前期(驻金华时期,1939年2月至1942年夏)。

台湾义勇队成立后,一面加强组织建设,一面按其队员的特长,分别组织参加各项抗日活动。李友邦将第一批台胞中的医生组成一个巡回医疗队,为抗日军民义务看病,其他台胞做政治宣传工作。1939年3月初,张一之去福建把第二批30位台胞接到金华后,两批计60人,编为台湾义勇队第一支队。当时,要求参加台湾义勇队的台胞“纷至沓来”,但只能采取分期编队的办法,暂限定参加的人数,先编组第一支队,再继续成立第二支队、第三支队。^①1940年6月,台湾义勇队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批准,李友邦被委任为少将队长,受军委会政治部领导,归第三战区政治部(设在江西上饶)节制。1940年8月,台湾义勇队第三区队(支队改名)成立,队员人数达200人。队部设有总务组、指导训练组、宣传组,另设有驻闽办事处和驻渝通讯处。李友邦对队员有严格的要求,每个支队(区队)的成立,都必须进行两至三个月的训练。训练的内容有理论学习、组织教育、技术教育(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史地、语言及对敌宣传技术)等方面。通过严格训练,队员“才能有深刻的言论,机警统一的行动和纯洁的纪律生活……才能完成时代给予我们的任务”。^②

李友邦始终拥护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接受共产党的帮助。他热情欢迎和邀请祖国的爱国人士参加义勇队和少年团的工作。因此,有不少大陆各地的爱国青年参加台湾义勇队,担任秘书、刊物编辑、少年团指导员等工作。在台湾义勇队里建有中共特别支部,协助李友邦开展工作,巩固和发展台湾义勇队。台湾义勇队的工作,还得到中共中央的关怀。1939年春,周恩来来到浙江视察时,强调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指示台湾义勇队要

① 张一之:《为“保卫祖国,解放台湾”而斗争——台湾义勇队略记》,《朝鲜义勇队通讯》第15期(1939年6月)。

② 牛光祖:《为什么训练和如何训练》,《台湾先锋》第5期(1940年9月15日)。

充分运用国民党的关系开展工作。关于找军委会政治部批准正式成立问题就是周恩来建议李友邦去找黄绍竑联系解决的。^① 台湾义勇队队员亲自聆听了周恩来关于抗战形势的报告,深受鼓舞。他们还学习《论持久战》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容的著作,武装了思想。

台湾义勇队广泛地活动于东南各省及重庆等地,在前方和后方开展各项抗日活动,工作十分艰苦,有的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他们坚决抗战的英勇行为和爱国主义精神,受到全国各界的广泛赞扬,国民党要员及社会著名人士称赞其为“台湾先锋,民族战士,唤起国魂”,体现了“祖国精神”。^② 1940年12月,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出席衢县各界国民月会及扩大纪念周,曾赞扬李友邦及台湾义勇队“实际参加祖国抗战,劳绩卓著”。^③ 1942年初,得到军委会政治部的传令嘉奖。

后期(驻龙岩时期,1942年秋至1945年底)。

1942年5月浙赣战役爆发,台湾义勇队坚持到最后时刻才奉命撤离金华,经江山,翻仙霞岭,再经福建的浦城、建阳、南平、永安,于10月中旬到达目的地龙岩。由于四个月的长途跋涉,途中损失了一大批辎重和药品,台湾义勇队在经济上处于困顿万分的状态。虽喘息未定,李友邦就立即采取各种措施,特别是筹办干部训练事宜。同年11月1日,干训班开训,经过两个月的学习之后,将学员分编三组,赴闽南各地工作。由于上级命令限期成立“三青团”组织,于是义勇队在途经南平时成立了三青团中央直属台湾义勇队分团部筹备处,1943年1月在龙岩正式成立,李友邦任主任干事。李友邦以台湾革命的需要为出发点,把三青团看作是团结和教育台湾青年干部的学校,使参加者“个个成为建设三民主义新台

① 张毕来:《台湾义勇队》,《革命史资料》第8辑。

② 于右任、李济深等人题词,《台湾先锋》第4期(1940年8月15日)。

③ 陈诚:《台湾革命与中国革命》,《台湾先锋》第7期(1941年3月15日)。

湾之坚强有力的干部”。^①

台湾义勇队移驻龙岩后,队员人数也有较大的发展,于是改台湾义勇队为台湾义勇总队。据1943年《台湾义勇队队员名册》统计,有队员301人。^②1945年队员人数已达到381人,编为四个区队。在此期间,由于当地政府把台湾义勇队排斥在驻军之外,不供应日常物品,义勇队生活十分清苦,只好靠生产自救的办法来解决生活困难,这直接影响到工作的开展。活动范围也仅局限于闽南一隅,与前期相比,队员们“感到苦闷”。^③

1945年8月,日寇宣布投降。9月3日,李友邦即派台湾义勇总队副队长张士德,随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柯尧上将乘飞机赴台,在台北升起台湾光复后的第一面中国国旗。9月7日,台湾义勇队总队部由龙岩迁往漳州,不久队员陆续返台。10月23日,台湾义勇总队先遣部队抵台,协助政府维护社会秩序及保管物资。12月8日,李友邦率全体队员返台。正当他们刚刚凯旋荣归,准备为“建设台湾”再次奉献之际,突然接到政府当局的命令:“台湾义勇总队解散。”“没有原委,没有安抚,顿时这支曾经为民族国家为台湾抛头颅、洒热血的抗日革命队伍,骤然间成为一支失业队伍。”^④但是,历史是公正的,海峡两岸人民永远铭记着他们的巨大功绩。

二

台湾义勇队的抗日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宣传教育工作。主要是通过讲演会、招待会、纪念会、募捐

① 李友邦:《台湾革命运动》,台湾人间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46页。

② 转引自《中国史学论文选集》第1集,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3年版,第865页。

③ 潘叔华:《李总队长,我们怀念您——纪念李友邦牺牲39周年》,《台声》1991年第7期。

④ 严秀峰:《台湾义勇队与抗战》,《台湾史研究会会讯》第2期(1987年8月台湾出版)。

活动和出版书刊等形式,为抗日救国呐喊,以激励台胞和全国军民的斗志。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宣传台湾革命历史和台湾革命运动的当前任务。在1939年一年里,李友邦、张一之等在金华、桂林等地就作了十多场关于台湾问题的报告、讲演,如李友邦在桂林中国新闻记者协会联谊会上的讲演,在金华开会招待日台俘虏,他和华云游在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总司令部无线电训练班讲演,张一之在金华县第五学区辅导会议的讲演等。1940年3月,李友邦曾赴重庆国际广播电台讲演,号召“台湾同胞团结起来,和日本军阀斗争以求解放”。^①台湾义勇队还组织战地工作队,深入前线和抗日部队的官兵一起生活战斗,用讲演会、歌咏会、座谈会等方式,讲述亲身经历的亡国之痛,激励官兵奋勇杀敌,均收到很好的效果。如李友邦曾亲自带领宣传队在闽西南为军中文化基金及豫灾救济金进行募捐宣传公演达四个月。为了做好经常性的队内教育和对外宣传工作,义勇队先后出版了《台湾先锋》、《台湾青年》及“台湾革命丛书”等书刊。《台湾先锋》(月刊,后不定期),于1940年4月15日在金华创刊,共出版10期,与金华各刊物联合出版特刊2期(“抗战建国三周年联合特刊”及“元旦特刊”),李友邦任主编。它着重宣传台湾革命斗争历史,探讨台湾革命运动的理论,报导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的抗日活动。《台湾先锋》停刊后,又于1943年元旦在龙岩创刊《台湾青年》报,始为旬刊,1944年1月改为周刊,牛光祖任主编。它以“保卫祖国,收复台湾”为目标,宣传抗战建国国策,报导国际时局动向,尤侧重于对敌伪动态的揭露,台湾收复问题的研讨,以及三青团团务的报导。这两个刊物都发行全国各地,曾在1944年于贵阳举办的“全国报纸杂志图表照片展览”中展出。另外,每周还出版一张《台湾壁报》,少年团还出版过小型杂志《台星》。“台湾革命丛书”的出版,旨在系统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介绍台湾人民不屈的抗日斗争事迹。该丛书最先

① 《新华日报》,1940年3月29日。

出版的就是李友邦著的《日本在台湾之殖民地政策》(1941年1月于金华出版),陆续出版的还有《台湾土地问题》、《台湾民族解放运动史》及四幕剧《台湾之路》。在龙岩出版的有《台湾革命运动》(李友邦著)、《台湾现状摘要》、《台湾复员对策纲要》、《日本军政人物评论》等著作。

(二)对敌政治工作。台湾义勇队成立后,李友邦指出:“瓦解敌军和教化俘虏,将是台湾义勇队的主要工作。”^①他强调说:“祖国抗战在第二阶段,是政治重于军事的时候,促使敌国士兵觉悟,进而达到瓦解敌军,实为当务之急。”^②由于他们较多地了解日本士兵的生活和心理状况,而且都能读会讲日语,因此,经过短期训练之后,常被派到各抗日部队和各界战地工作团,负责教育训练部队士兵和民众对敌工作的认识和方法,帮助士兵学习日语喊话和唱日本反战歌曲,翻译敌军文件,审讯俘虏,收听日军广播,收集敌伪情报等。在沦陷区,义勇队队员还经常散发反战标语,画壁报,即使和敌军遭遇时,队员们也能沉着地用日语喊话。这些活动对打击敌军作战情绪,收到相当大的效果。在闽南,义勇队还专门组织了对敌巡回工作团,并曾派人到驻闽某师工作,协助该师深入敌区,从事对敌伪的反战宣传并鼓励民众坚持抗战。队员们的工作热情和奋斗精神,得到部队官兵的赞扬。重庆《扫荡报》发表社论《中国抗战与朝鲜台湾》称:“他们为了协助我军杀敌,过去两年中,曾在各战场进行对敌宣传工作,并深入敌后,唤醒敌兵投诚,出生入死,艰苦奋斗,屡建奇勋。”^③台湾义勇队还在前线利用各种手段,为抗日部队收集敌伪情报,如伪装成走私船出入敌占区,或以重金贿赂敌伪人员,或打入敌伪军政机构及沦陷区一些职业团体。据统计,1943年1月至1944年10月,台湾义勇队共为抗日武装提供敌伪

① 李友邦:《台湾义勇队之组织及其工作》,《东南战线》第1卷第4期(1939年3月5日)。

② 李友邦:《台湾义勇队近况》,《东南日报》1940年3月1日。

③ 《台湾先锋》,第4期(1940年8月15日)。

情报 178 件,其中厦金敌伪情报 90 件,嵛山岛敌伪情报 12 件,浙江沦陷区敌伪情报 8 件,上海敌伪情报 10 件,沿海各地敌伪情报 58 件。^①

(三)医疗工作。台湾义勇队队员中医疗人员比较多,因此李友邦一直把医疗作为义勇队的主要工作之一(也是当时抗战急需)。最初义勇队在金华城内设立医疗所,义务医治伤病军民。不久,又在金华乡下设立医疗所和巡回医疗队,方便广大农村病人就地治病。为了扩大规模和设备,1940 年 7 月间,又派第一区队长谢铮强等专程赴闽北崇安一带招募台籍医生和运购新式医疗仪器,并将金华医疗队扩充为三个台湾医院,先后分设在金华(第一)、衢州(第二)、兰溪(第三)三地。1942 年 5 月浙赣战役爆发后,他们在撤退途中,于江山成立临时医院,及时救护西撤的伤病军民。转进福建后,义勇队在建阳设立台湾医院,也称第四台湾医院。此外,他们还经常派医生到各地各单位义务行医或从事卫生防疫工作。有的被派到浙东前线参加当地野战医院的救护工作,他们既当医生,又做对敌政治工作,很受前线官兵和当地群众的赞扬。如在浙江儿童保育会第二保育院服务的台湾医生,被称赞“医术高明,而且有一颗热爱儿童的心”。^②到福建后,他们“仍本着在浙江的一贯作风”,“对荣军、征属、义民、贫民则完全免费治疗,因此极为当地人士之爱护。”^③

(四)经济工作。当时,前线和后方战时物资非常紧缺,为了协助当地政府恢复和发展生产,台湾义勇队曾派有生产技术的队员分别协助闽浙两省建设厅在崇安和丽水筹设樟脑制造厂,生产军火原料樟脑及作动力用的樟脑油。在浙江,队员庄德三、李升平首先协助省建设厅办起樟脑生产试验场,就地取材,土法上马,克服

① 林真:《台湾义勇队的筹组及在福建的活动》,《台湾研究集刊》1991 年第 4 期。

② 浙江省妇女联合会编:《抗日烽火中的浙江妇女》,编者印行,1985 年版,第 82 页。

③ 张士德:《从金华转进龙岩——台湾义勇队工作近况》,《台湾青年》1944 年 1 月 1 日。

种种困难,制造出樟脑油,其质量胜于煤油,可与柴油相比。然后在丽水水南正式设立总厂,分设八个分场及一些流动工场。该厂到抗战胜利后才撤销停产。另外,队员庄惠民、黄授杰等还在金华协助东关药品生产合作社,采用国产原料生产战场急需的药品,其产品多数直接送往前方部队。

(五)组织台湾少年团,培养青年干部。台湾少年团团员大部分是台湾义勇队队员的年幼子女,他们不愿受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而跟随父母逃到祖国大陆。把他们组织起来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参加革命,在实际斗争中锻炼成长。李友邦认识到,革命需要后继有人。他说:“深知台湾革命的成功,非短时间之事,是需要长时期的奋斗,台湾儿童,要在祖国抗战之中,锻炼他们自己,以便将来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最后斗争之用。”^①他们肩负着台湾独立解放和建设新台湾的双重任务,“是台湾革命的继承者和新台湾的建设者。”^②台湾少年团配有专职指导员,其任务是:组织学习文化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带领他们参加抗日斗争活动。学习的课程包括政治常识、军事常识、自然科学常识、台湾革命史、中国语文、日文,以及艺术训练等,强调“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他们的工作,主要是通过讲演、演戏、唱歌、绘画等活动进行抗日宣传,有时做一些翻译和收集情报工作。台湾少年团既是一个教育机构,同时又是一个工作机构。^③他们除在驻地参加各种活动外,还多次被派到前线或其他地方流动宣传、访问日俘。武夷山上至今还留下当年台湾少年团书写的“保卫祖国,解放台湾”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大幅标语。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卓著贡献,曾引起中外教育家的注目,美国友好人士、少年儿童教育家卡克斯也访问过台湾少年团。

① 李友邦:《我们的工作》,《台湾先锋》第1期(1940年4月15日)。

② 李友邦:《为什么组织台湾少年团》,《台湾先锋》第8期(1941年5月15日)。

③ 夏云:《台湾少年团在浙江》,《浙江革命史料选辑》(7),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六)促成大陆台胞抗日力量的统一。李友邦把“统一台湾革命组织”作为台湾独立革命党和台湾义勇队的一项重要任务。1940年3月,李友邦在重庆主动与“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联络,于黄花岗纪念日(3月29日)发表共同宣言,宣布台湾独立革命党和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结成“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表示两革命团体“誓愿精诚团结,群策群力,为促成祖国抗战胜利,台胞自由解放而携手奋斗”。^①由谢南光、李友邦、张邦杰三人任联合会常委,轮流担任主席。同年7月25日,台湾青年革命党及台湾国民革命党也加入了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成立后,李友邦要求台湾义勇队队员为此作最大的努力,最大的牺牲,以造成光明的前途。^②1941年2月,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在重庆召开有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台湾青年革命党、台湾国民革命党和台湾革命党五大抗日政团参加的代表大会。会议决定解散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由所属各团体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同时成立南、北方执行部。李友邦任主席团执行委员,台湾义勇队队员牛光祖、李祝三、王正西、李明法等也分别担任执委、候补执委、监委。1942年3月,李友邦等又赴重庆出席台湾革命同盟会第二届临时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完成了台湾各革命团体的统一,并在新的形势下决定以“复土复省运动”为中心目标。在大会宣言中“确立台湾革命同盟会为台湾革命之最高指挥机关”,“再由机关幅射运用于各地方组织及其他特殊单位”。^③会议决定取消南、北方执行部,改为在重庆设总会,在各地设八个分会。从此,正式形成了台湾同胞在祖国大陆的抗日联合阵线。

(七)团结国际反法西斯力量。早在1938年12月,李友邦就曾在桂林,同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和朝鲜义勇队陈关斌一起,准备

① 《台湾两革命团体合作组织革命联合会》,《新华日报》1940年3月29日。

② 李友邦:《为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成立告本党本队同志》,《台湾先锋》第2期(1940年5月15日)。

③ 《台湾革命同盟会第二届大会宣言》,《新华日报》1942年4月5日。

组织“日韩台反法西斯大同盟”。1939年2月,李友邦在金华举行日台俘虏招待会,提出“中日台民众联合起来”,“日本的民众是我们的好朋友”等口号。台湾义勇队与朝鲜、日本的革命志士,在抗战中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他们在工作中,与朝鲜义勇队互相学习,互相支持。朝鲜义勇队从精神上和物质上支援台湾义勇队的成立,还曾派了两名队员到台湾义勇队工作,便于互相联系,交流工作经验。台湾义勇队也大力帮助朝鲜义勇队驻金华办事处,曾合组“韩台剧团”。大家称两个义勇队“是民族的先锋,是共患难同奋斗的两姐妹”。^① 李友邦与鹿地亘也多次友好往来,当鹿地亘发起成立“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时,台湾义勇队立即致函祝贺,赞扬鹿地亘和反战同盟的同志为中国抗战作出的努力,表示愿共同“为了日本人民革命和朝鲜、台湾民族的解放”,“为了实现东亚各民族真正的永久的友谊和和平而努力”。^② 台湾义勇队驻渝通讯处还与日本、朝鲜的革命志士组织日韩台俘虏访问团,共同进行瓦解敌军工作。

(八)发起台湾复省运动和参加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台湾复省运动是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形势胜利发展的结果。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国际形势越来越不利于日本侵略者。因此,台湾义勇队、台湾革命同盟会等组织积极进行台湾复省运动,纷纷贡献光复大计。李友邦曾多次撰文发表讲话,阐明了台湾复省的意义和措施。《台湾先锋》第10期推出了“台湾光复运动特辑”,李友邦发表了《台湾复省在同盟国战略上的意义》一文,从战略上阐明了“台湾的地位,已经决定了它与祖国的复兴不可分割,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前途更有密切关系。因此,同盟国要争取太平洋的胜利,就必须援助台湾,争取台湾”;从政略上阐明了中国政府恢复行

① 李达:《我们是两姐妹——朝鲜义勇队和台湾义勇队》,《台湾先锋》第4期(1940年8月15日)。

② 《本队致日本在华人民反战同盟信》,《台湾先锋》第1期(1940年4月15日)。

省,不仅表明“决心收复一切失地”,而且“给与了和日寇斗争四十七年的台湾民众一个热的鼓励,光的指示”。“特辑”还发表了冯玉祥、孙科、陈立夫及国际友人青山和夫等人的文章。重庆各报也相继出版了“台湾复省运动特刊”。国民党为了适应当时形势,不久成立了中央直属台湾党部(相当于台湾省党部),李友邦被任命为台湾党部设计委员。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国共同发表开罗宣言后,台湾回归祖国已得到国际确认,台湾义勇队为此欢欣鼓舞。正在重庆的李友邦,与有关方面详细商讨了关于收复台湾善后处理及建省运动中各项问题。^①台湾义勇队队员们戴上了“复疆”的臂章,表示以光复台湾为职志。1944年4月27日,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聘李友邦为兼任专门委员(后为调查委员会委员),聘谢挣强为兼任专员。李友邦和李祝三、曾溪水等参加了该委员会召开的座谈会,在会上表达了台胞对收复台湾的决心,并为做好接收台湾的准备工作献计献策。^②台湾义勇队还多次提供台湾问题资料,不少队员参加了中央训练团举办的台湾党政干部训练班。

三

台湾义勇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他们继承了台湾人民长期坚持反侵略反压迫斗争的光荣革命传统。

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后,台湾人民“义不臣倭”,立即掀起反割台斗争,从1895年5月建立“台湾民主国”,“第一次高扬抗日民主的大旗”^③以来,台湾人民前仆后继,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

① 《台湾建省各项问题均商得良好结果》,《台湾青年》1944年3月11日。

② 陈鸣钟、陈兴唐编:《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5、7、23页。

③ 《台湾回到祖国来!》,《新华日报》1943年6月17日社论。

日本占领台湾的半个世纪里,规模较大的反日武装斗争就有 20 多次,在历次反日斗争中牺牲者达 65 万人。^①至于平时被迫害而惨死者仅在被日寇占领的最初十年间,就达 50 万人以上。^②为了使队员和祖国人民了解台湾革命斗争的历史,台湾义勇队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宣传教育。李友邦多次通过会议、刊物、撰写专著,宣传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事迹,揭露日据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的压迫和掠夺;同时,将台湾革命史列为每个队员训练的主要内容之一,为台湾少年团专门开设台湾革命史课程,每逢“马关条约”国耻日和反割台斗争成立“台湾民主国”日举行纪念活动,启发其队员、团员的革命觉悟。因此,他们都懂得自己所肩负的光荣使命,连少年团的团员也都表现出坚强的革命意志,“我们年纪虽小,也应该救国”,“要替已死的同胞报仇”,决心“要打回老家去”,赶走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台湾。^③

台湾义勇队的抗日斗争是伟大的全民族抗战的组成部分,是抗战取得胜利的重要力量。“七七”全面抗战爆发,使台湾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此,台湾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已经摆脱了长期以来孤军作战的状态,与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互相密切配合;而祖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必然导致台湾人民永远结束日本殖民统治,重归祖国的怀抱。因此,台湾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是祖国人民反帝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李友邦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组织台湾义勇队,动员台胞投入声势浩大的全民族抗战的。台湾义勇队队员和在大陆的其他台胞,积极参加祖国抗战,与全民族抗战融合在一起。他们的斗争又与台湾岛内的人民进行的抗日、反战斗争交相辉映,为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绩。所以,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民族团结的胜利,是民

① 何方:《重印〈台湾府志三种〉序》,《台湾府志三种》,中华书局 1985 年版;李洁非:《台湾》,商务印书馆 1945 年版,第 111 页。

② 刘敏夫:《台湾青年抗日斗争的生长》,《浙江潮》第 104 期(1940 年 4 月 30 日)。

③ 《在革命中成长的台湾儿童》,《东南战线》第 1 卷 4 期(1939 年 3 月 5 日)。

族凝聚力的胜利。

台湾义勇队积极参加祖国抗战,再次说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人民始终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数十年来,“虽日寇竭死力以奴化,务使忘其祖国以永久奴役于日人,然台人眷念祖国的深情,实与日俱增,时间愈久,其情愈殷,是并未尝有时刻的忘却过”。^① 台胞在台湾岛内多次发动武装斗争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之外,还经常有不少台胞冒着生命的危险,冲破层层障碍,回到大陆来生活、学习,或参加革命斗争。抗战时期,是台胞在更大的规模上参加祖国的革命斗争,他们为“台湾独立,归返祖国”的目标而战。李友邦在台湾革命志士中率先提出“归返祖国”的主张。他发表的《台湾要独立,也要归返祖国》等许多重要文章,全面地阐述了台湾革命运动的斗争目标——“争取独立,归返祖国”。台胞的民族意识不断增强。台湾义勇队队员和少年团团员们在演讲中,每次开场白总是讲:“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语言真挚感人。当抗日战争接近胜利之际,李友邦又及时地提出:“台湾革命的内容,将由‘保卫祖国,收复台湾’而进入‘建设台湾,保卫祖国’的阶段。”“前者的目的在脱离日寇的统治,回归祖国;后者的目的则以建立国防的基地,拱卫祖国的安全。”^② 台湾是祖国的天然屏障,祖国不能没有台湾。台胞坚决反对当时国际上一度出现的“国际共管”的暗流。李友邦强调说:台湾人民只能回归祖国,才能重新“共聚于一堂,同心协力,建立三民主义之新中国,享和平之福于久远。”^③ 可见,为了维护祖国领土的完整,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共同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作者单位:杭州大学历史系)

① 李友邦:《台湾革命运动》,第1页。

② 李友邦:《开罗会议后之台湾问题》,《台湾青年》1944年6月17日。

③ 李友邦:《我们的祖国》,《台湾先锋》第4期(1940年8月15日)。